首次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程为坤

首次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于1988年12月29日至1989年1月2日在长沙举行。这次会议是由湖南省政协、省社联、省社科院、省历史学会、民革湖南省委等十三个单位联合发起举办的，与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共100多人，收到论文58篇，展示了黄兴研究的最新成果。现将讨论情况及主要观点简述如下：

一、总体评价

黄兴是辛亥革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爱国主义者，是与孙中山先生齐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许多同志认为，过去，由于我们受新旧正统主义思想的影响及左倾路线的干扰，扬孙抑黄，重孙轻黄，使黄兴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评价偏低。今天，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黄兴的是非功过重新评价，充分肯定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纠正以往加在他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有的学者指出，将黄兴贬为“常败将军”是不恰当的，黄兴在领导辛亥革命前的武装起义中建过殊勋，虽然有些起义失败了，但那是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对比悬殊、饷械不济造成的，并非完全是黄兴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说孙是理想，黄是实行，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在辛亥革命期间，黄兴十分重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三民主义思想体系，固然属孙中山首创，但是，它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黄兴作为革命党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其对三民主义的具体阐发也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理论。因此，不能把黄兴说成是一个没有理论和理想的“实行家”。还有的学者认为，黄兴不是革命党中的“右派”，而是“左派”。辛亥前，孙黄并称，黄兴是仅次于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左派领袖。在武昌起义中，黄兴为推翻清朝，建立共和，立下了卓越功勋。二次革命前，他同孙中山一样受袁世凯欺骗，反映了革命党的妥协性和短见。二次革命后，他对局势分析有误，一度表现软弱，消极。纵观其一生，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瑕不掩瑜，偏不盖全，他仍然是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同盟会的左派。

二、革命实践

关于黄兴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实践活动，是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对黄兴在各个时期的主要活动均有专文论述，其中不乏新的见解。

关于黄兴与同盟会的关系问题，有的日本学者以大量史料证实，孙中山与留日革命学生合作的计划，黄兴是主要的发起人，正是由于黄兴及华兴会的配合，孙中山才得以联合各方面的力量，创建中国同盟会。黄兴与会党的关系，过去谈到的不多。这次有的文章就黄兴在武昌起义前如何争取团结会党、帮助他们提高觉悟、克服弱点，并把他们的斗争提高到民主革命运动的水平等问题，作了系统论述，揭示了黄兴在运动会党从事反清革命方面的历史功绩。关于黄兴在民初政争及二次革命中的表现问题，文章较多。有的同志指出：南京留守府的设立，是袁世凯与革命党人妥协的产物，黄兴出任留守，是作为继孙中山之后南方革命力量的代表和旗帜。他的裁军与辞职固然具有消极作用，但这与南方资产阶级背弃革命的态度

有关，不完全是他自已认识上的错误。有的同志对于辛亥革命后黄兴政治立场“日以右倾”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作出这一评论的胡汉民“免不了宗派和地域的偏见”。如果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三人在这一时间内的政治意向作一比较，孙一直倾向于让权袁氏，而自己则从事实业活动；宋对袁抱不信任态度，一直力图限制袁的独裁；黄则介于二者之间，他曾与袁世凯集团发生矛盾，但自入京后，又对袁转而信任与支持，直到宋案发生后方才觉悟。有的同志不赞成说黄兴在二次革命中“独断独行”，只主张法律解决宋案，而反对立即开战，并应对开战即败负责。指出黄兴实际上主张以武力与法律并行来解决宋案，在二次革命中高举反袁大旗，站在斗争前列，革命的失败，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即使按孙中山的办法解决宋案，或由孙主持南京讨袁，同样难脱失败的命运。至于黄兴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不少学者反对说是分裂行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的孙黄分歧，是二次革命失败后发展党务的不同方法之争。黄在组党上坚持民主原则，抵制孙中山要党员服从党魁一人，并在誓约上按指印以志矢忠的错误做法。他虽未入党，却也没另建他党。他的远适欧美，是听从了孙中山的劝告，对于陈其美等人的攻击，他也采取忍让态度。总之，仍然是顾全大局、以团结为重的。关于黄兴与日本的关系，有的日本学者撰文考察了留学日本对黄兴的影响以及同时代的日本人对黄兴的评价，揭示了黄兴的思想和革命实践与日本的密切关系。有的日本学者则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的记载，详细叙述了二次革命后孙黄等人在日本友人的帮助下出亡日本的经过，补充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不足。

三、思想品格

过去对于黄兴思想品格的研究，是十分薄弱的。这次会议上、除了阐述他的政治思想外，对其军事、教育、实业等方面的思想，也多有涉及。有的学者在论及黄兴的社会主义思想时指出：黄兴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忠实信奉者，他所主张的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不是主观的，空想的，而是有利于私人小型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主张在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允许包括个体经济、合作经济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因此，它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所提出的经济模式基本上一致，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的学者在论述黄兴的教育思想时指出，黄兴的教育思想相当广泛，既论及学校教育，又谈到社会教育，不仅涉及一些教育理论，更提出了许多可行的教育主张，主要体现了其崇尚实效、讲求实利的实用主义教育观点。有的学者在论述黄兴的实业建设思想时指出，辛亥革命后，黄兴对于实业建设发表过诸多主张和见解，涉及到民初国家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问题，如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建设中各部门之间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对外开放、发展教育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见解和主张尚不够系统，但仍不乏真知灼见。还有的学者对黄兴武装斗争的思想特点进行概括，指出黄兴发动和领导武装斗争的目的是拯救民族危亡，推翻帝制，缔造共和。

关于黄兴的品格和心态，以往并无专文论述。这次会议，也有同志作了探讨。有的文章认为：黄兴的品格特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具有意识倾向和支配性质的基本特质，其内容包括躬行实践、注重实际的崇实倾向，忘我无私、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二是反映心理倾向和生物特征的主要特质，其内容包括雄豪刚毅，宽厚大度，自信自尊，谨严谦逊等品质。黄兴的个性特征除了某些天赋素质外，主要是家庭、教育、社会、时代多种后天环境因素所造成，尤其典型地反映了湖湘文化务实求治、锐意进取的精神。有的文章通过分析黄花岗起义前后黄兴的心态变化，指出黄兴在气质上偏重于粘液质，在性格上偏重于理智性或内倾性，受这种气质和性格所制约，当情绪稳定时，黄兴就表现出平心固守，虚衷镇密，容忍谦让，

温良和霭这样的特性，但当情绪不稳时，他又常常表现得孤僻隐退，保守固执，厌世悲观，焦虑忧郁。黄兴心理上的弱点，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时代通病。

四、人际关系

黄兴与孙中山的关系是一个旧的话题，但这次有人从文化背景上对这个问题作了新的解释。认为黄兴在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时，一直是以“免陷兴于不义”为指导思想的。同盟会时期，由于革命党人内部的主要矛盾是孙中山与章太炎等人之间的矛盾，黄兴是以调停人身份出现，故其“免陷兴于不义”的思想不难收倾心拥护孙中山的功效。而二次革命后，主要矛盾在孙黄之间，且孙本人有不当之处，在中华革命党章程上两人分歧甚大，彼此互不让步，黄“免陷兴于不义”的思想原则派生出一个对中山敬而远之的方案。黄的这一指导思想来源于以克已忍让为要求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和处世哲学。关于黄兴、孙中山在日本初识的介绍人问题，过去一直存在两种说法，一是宫崎滔天，一是杨度。这次有的学者依据新发现的史料证实，1905年夏孙中山抵日后，是宫崎滔天介绍他并亲自带他找到黄兴，初识于东京凤乐园，但在此之前，就有人向孙黄介绍对方，特别是杨度曾向孙中山介绍黄兴，促成二人握手建交。此外，对黄兴与宋教仁、谭人凤等人的关系，也有学者进行探讨。

五、研究方法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以往国内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总喜欢在政治上划分左、中、右，赞成错误三七或四六开，有一指与九指之分。其实，这是一种机械唯物论或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黄兴研究也受了这一思维方式的影响，如给他戴上“右派”、“妥协分子”之类的帽子。实际上，左不一定就好，右不一定就坏，关键是要看一个历史人物的言行是否符合时代潮流，是否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革命斗争中既需要强硬，也需要妥协，妥协是为达到政治目的而采用的手段，并没什么不好。三七或四六开地评价一个人的功过也不科学，功不应掩过，过也不能障功，有时十指中一指烂了也会死人。在黄兴研究中，我们必须排除某些因素的干扰，完全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其功过是非给予客观评价。在坚持阶级分析方法的同时，我们也不访借鉴运用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比较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方法和手段，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观察、剖析黄兴及辛亥革命时代的历史人物，以求达到科学的认识。

此外，这次会议还公布了一批新近发现的黄兴史料，并且准备精选一批与会文章，编辑出版黄兴研究的论文集。这些，无疑有助于推动黄兴及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